

14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一九八二年第一輯（總第十二輯）



14266/12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总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 怀念黄道同志.....方志纯（1）
- 宁死不屈的彭树敏烈士.....饶来杰 彭清 熊巢生（9）
- 红十军团进军皖南浙西南的斗争.....张德华（13）
- 回忆南进浙赣线开辟新区的斗争.....朱 农（20）
- 回忆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厂.....李玉恒（36）
- 回忆北伐军三打南昌.....李世璋遗作（41）
- 上饶集中营略史.....蔡水泉（45）
- 国民党星子特训班概况.....方 舟（64）
- 我所知道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张练庵（75）
- 国民党青年军及其庐山会议.....罗长安（79）
-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陈贻琛（85）
- 国民党江西“惩共”委员会见闻片断.....方 舟（99）
- 名中医姚国美先生生平事略.....姚荷生（102）
- 回忆抗战时期的江西防空事业.....傅朝梧（109）
- 江西历史上的体育学校.....张允建（120）
- 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赵秉钰（128）

刘士毅逃台前的历史纪实.....	袁小帆 (134)
曹浩森的生平.....	邵天柱 (147)
王次甫与政学系.....	王邦范 (154)

我所知道的汉奸肖淑宇案的内幕.....	陈 达 (162)
《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杨永泰内幕》史实有错误.....	俞兴茂 (170)

怀念黄道同志

方志纯

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北京中南海内，胡耀邦同志接见我们江西的几位同志时，曾谈到过黄道同志。在这以前，我正在收集黄道同志从事革命斗争事迹的资料，准备写篇文章纪念他。胡耀邦同志接见时的谈话，使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早在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九年初，我曾先后写了纪念方志敏、邵式平同志的回忆文章。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布置了任务：一定要写一篇纪念黄道同志的文章。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这是赣东北根据地的三位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他们的英名，已经永远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的事迹，已经广泛地流传在人民群众之中。在纪念党的生日的日子里，缅怀先烈的光辉业绩，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与我朝夕相处了十年之久的黄道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黄道是一九二四年的夏天，他和邵式平一同路过南昌去北京上学。当时，我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就在这个党的秘密机关里，我见到了在江西、南昌进步学生中早已闻名的黄道同志。

黄道生于一九〇〇年，与邵式平同年，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在南昌读书时，就和袁玉冰等一道发起和组织了江西最早的进步社会团体——“鄱阳湖社”。

“鄱阳湖社”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规划后，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改名为“江西改造社”。改造社正式建立后，出版了自己的社刊——《新江西》，成为“五四”时期全国有影响的进步社会团体和进步刊物

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黄道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

中学毕业后，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又与邵式平同学。在北师大，黄道继续领导了“江西改造社北京分社”的活动。在斗争中，他结识了李大钊，陈毅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下，他于一九二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参与了北师大党支部的领导工作。

黄道每年暑假都要回到家乡横峰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列主义。我从方志敏等同志那里早已多次听过他的名字和他的斗争事迹，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这一次，他们结束暑假返校时，才在南昌见到了他。

他个子高大而魁梧，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微微发胖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穿一身当时学生中流行的长褂，既显示出学生的潇洒风度，又保留着农村子弟的朴实无华。一双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却显得格外深邃、坚毅而沉着。高高的鼻子，不知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还是意味着他的脾气偏急，鼻梁上常常沁着淡淡的一层细汗；而那一双厚厚的嘴唇，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黄道知道我与志敏的关系，大概又从赵醒依同志那里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见面的时候，他叫我有机会碰到志敏时要代他问候，同时，还嘱咐我要好好安心在省委机关工作，保护好机关，精心照顾好赵醒依同志。他还勉励我，要多看点书，多学点革命的理论。“今后我们肩上的担子重着呢！”他拍着我的肩膀，认真地对我说。

他匆匆地走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又很快回来了。

那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黄道奉组织之命，返回江西开展革命工作，又和邵式平一道回到了南昌。回江西后，黄道积极参与了江西党、团组织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的活动。当时，适逢学校放暑假，党团组织研究决定：乘学生放假之机，动员学生下乡宣传，将革命思想灌输到基层中去。方志敏、黄道商定回赣东北去，并决定沿途一路进行宣传。于是，我随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从南昌出发，到了进贤、东乡、余江、贵溪、弋阳、上饶、玉山、乐平、鄱阳等县，将反帝爱国的思想，将马列主义的思想，深入宣传到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当中去。这一路上，黄道言传身教，给了我不少启迪、教育，使我受益不浅。

暑假很快就结束了，我随着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月的战斗生活。

回北京后，黄道介绍邵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后，他和邵式平都被军阀当局通缉，在北京呆不下去了。于是，奉党的指示，黄道离京南下，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黄道回南昌后，有一天，和邵式平一道来省委机关看望赵醒侗同志。我见他们来了，高兴地为他们准备午饭。他们见状，一起赶来动手。赵醒侗见人多手杂，便推开我说：“今天‘解放’你，我们来当厨子”。说着，他们三个人就动手煮起水豆腐汤来。开始，赵醒侗忘记放盐，邵式平就抓了一把盐放进去，一尝，太咸了，黄道又加了一勺水进去，再一尝，又太淡了，赵醒侗又加盐。就这样水多加盐，盐多加水，一碗水豆腐竟煮了一脸盆豆腐汤，但是大家却都吃得津津有味，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战友的兄弟情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在南昌迎接了黄道回省后，很快又欢送他回故乡横峰去了。

早在一九二四年暑假，黄道回到家乡，就邀集了进步青年邹秀峰、吴先民、李穆、钱壁、程伯谦、黄球、黄端喜等人组织了“岑阳学会”，黄道亲自为该会起草了会章，制定了“宣传革命，吸收人才”的宗旨。为了扩大宣传，还出版了《岑阳月刊》。黄道离开横峰到北京后，仍然和该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和在家乡的会员之间，书信往来频繁，交流对时局的看法，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鼓舞革命斗志和信心。

这一次黄道回横峰后，吸收了经过斗争考验的“岑阳学会”会

员邹秀峰、吴先民、钱壁、李穆、黄端喜、程伯谦等同志入党，建立起横峰第一个党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横峰县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北伐军挥师北上，势如破竹，进入江西后，给江西的革命运动以极大的推动。黄道根据党的指示，通过国民党横峰县党部，领导农民协会，赶走了反动县长，游斗了横峰大地主邹寿先，使横峰县的政治局面为之一新。此时，适逢省委特派员邵式平在横峰，他便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组织了横峰县政务委员会，委任邹秀峰为县长，吴先民为公安局长。这样，横峰县的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手中了。

黄道在横峰及江西的革命活动，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及国民党左派的赞许，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并兼任宣传部长。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作期间，黄道为建立、巩固、发展我党在江西的统一战线，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政权“宁汉分家”，在朱培德尚未“礼送共产党出境”及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未公开暴露之前，黄道奔走于武汉、南昌之间，协助国民党武汉政府改组被右派控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不顾个人安危，力图扭转正在迅速恶化的江西时局。但为时不久，朱培德、汪精卫先后公开反共，国民党政府“宁汉合流”。黄道为争取时局好转所作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他不得不转入地下，参与中共江西省委领导，组织革命群众进行隐蔽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黄道还参与了“八一”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江西省委机关在南昌市杨家厂，我在机关任机要交通员，看见黄道日夜不停地往返于杨家厂、江西大旅社、花园街等地方，为武装起义进行着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以充沛的精力，高昂的斗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八一”起义胜利后，黄道出

席了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议组织了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相对立的全国性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在起义后的日子里，我看见黄道一天到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虽然我们天天见面，但大家都很忙，见面也没有时间多谈话，而那种高兴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八一”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形势急剧恶化，黄道和我都奉省委之命，返回赣东北，开展地下的斗争，秘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准备暴动。

“八一”起义前，方志敏同志就被礼送离开南昌，到赣西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九月，方志敏听了“八七”会议的传达后，回到弋阳漆工镇故乡。他叫我设法找到在赣东北地区各县坚持斗争的党员负责干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赣东北地区如何开展斗争。于是我立即动身前往横峰，我先到了姚家垅黄文中家里，黄文中曾同情过革命，他家里是地主，我住在他那里不引人注目。很快，我又找到了黄球。我的目的是要找黄道，但一直未打听到他的消息，但我知道，他肯定没有走远，就在家乡。一直到第三天，我终于找到了他，原来他就藏在自己家里的楼上。当我把方志敏决定开会的通知告诉他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表示同意志敏的决定，并爽快地答应保证到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由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等县党的负责同志的联席会，这就是赣东北党的历史上有名的窑头会议。会议上，黄道坚决支持方志敏有关武装起义的正确主张。会议后，方志敏与黄道的工作地点对调——方志敏是弋阳人，去横峰；黄道是横峰人，去弋阳。

我和黄道一同来到弋阳县漆工镇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团，我在义兴源，他在大溪头。从此，我们俩在一起，在方志敏、邵式平领导下，开始了创建和发展赣东北根据地的艰巨斗争。

弋横暴动胜利，赣东北根据地建立后，黄道是赣东北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赣东北省委常委），并长期担任省委秘书长、组织

部长、宣传部长等职，为赣东北党的壮大和发展，为赣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黄道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革命立场。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九年，在二十年的长期奋斗中，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在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和同志们共同奋斗的时候，还是他自己孤身苦战的时候，他都坚定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支持方志敏，反对和排除了“左”的、右的路线和思想的破坏、干扰，特别是在方胜峰会议上，他和方志敏、邵式平一道，批判了右倾逃跑思想，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当革命斗争需要他离开老区，前往贵溪开辟新区时，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开辟了新根据地，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巩固老区的斗争。

黄道同志长期分管干部工作，他对干部的教育抓得非常紧，经常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干部、武装干部、提高干部。在赣东北党校，他经常和学校领导一起，制订学习计划，编写教学讲义，讲授理论课程。当时，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文化水平都很低，特别是根据地刚开辟时，文盲还很多，为了提高根据地军民的文化水平，黄道还主持编写了列宁小学的《工农读物》等课本。黄道很注意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虽然个子高大，脸色严峻，但待人接物却和蔼可亲，同志们都乐意和他接触交谈。他也经常找人谈心，了解干部的思想动向，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工作。

黄道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既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维护革命利益，使革命事业免遭损失或少受损失。在当时的斗争，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思想领域的；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而这些斗争，又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联系，同时进行，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只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使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局面，争取胜利的前途。可是，当时我们的党，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党犯了许多

错误，赣东北党也犯过许多错误。当党内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黄道同志能努力做到既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一九三〇年五月，立三路线的中央，命令赣东北红军“进攻九江”、“截断长江”，赣东北根据地个别负责同志主张根据地不留一枪一弹，全力去攻打九江。黄道与方志敏等同志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因为是中央指示，他不能公开反对，便提出要留一部分武装力量保卫根据地。当时我代理军委书记职务，黄道反复和我商量，至少要留下一个营的兵力。后来，经过他和方志敏共同力争，终于如数留下了一个营的正规武装，使大部队离开根据地后，敌人进犯根据地时，群众未受到严重损失。方志敏常称赞他考虑问题很细致、周密。黄道与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在赣东北根据地谱写了一曲曲气势磅礴、有声有色的战斗篇章。

黄道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策略水平，能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形势，观察事物，特别是当远离上级领导或脱离上级领导的时候，他能准确地把握形势，审时度势，制定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革命政策和斗争策略。红军长征以后，黄道领导闽北党和群众，开始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当他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时，他及时地提出了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对地主土豪的作法；他还及时地提出了“改造大刀会”的主张，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消灭大刀会的作法，为革命武装减少了对立面。当“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预感到国共两党将要进行合作，在党中央指示未正式传达之前，他就编写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宣传提纲，对军民进行教育。当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南方游击队“下山”时，他又警惕地提出了“要把屁股坐在山上”的思想，因而在和国民党代表谈判过程中没有上当，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在脱离党中央、上级领导的情况下，黄道能够及时作出政策和策略上的这种改变是很不容易的。这反映了他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高超的革命领导艺术。

黄道参加革命后，一直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在生活上却从不搞特殊化，始终对自己，对子女严格要求。他个头大、身体胖，爬山很困难，但每逢行军打仗，他总是和部队一起行动，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黄道给友人的信中，曾自我总结说：“在这十年中，我经受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于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这是他一生艰苦奋斗，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期间，黄道是中共中央东南局负责人之一，主持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工作。一九三九年，正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党和人民需要他为革命作更多的工作，贡献更大力量的时候，他却在铅山县河口镇医院被敌人暗害了，时年仅三十九岁。

我最后一次见到黄道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他由闽赣省委秘书长调往闽北分区任区委书记。行前，我们为他送行。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日见艰难，革命事业处在明显的危急之中。那时，闽北根据地与建黎泰根据地未完全打通，他又是前去独挡一面，独立作战的。显然，以当时的险恶形势看，黄道此一去，前途莫测，生死未卜。我们彼此心情都很沉重，互相叮嘱保重。没想到，这次分手竟真成了永诀。

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的长河冲刷了许多往事，但黄道的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岁月的风烟，模糊了许多昔日的回忆，但对黄道的怀念，却一直使我魂系梦牵……一九六〇年，邵式平在《菩萨蛮·横峰县》一词中曾写道：“东风杨柳舞阡陌，大地染透阳春色。旭日照横峰，耸翠万山中。”每当我路过横峰看到那万山丛中的松柏耸翠时，我就想：那其中的一棵，不就是黄道同志吗！……

（一九八三年七月）

宁死不屈的彭树敏烈士

饶来杰 彭清 熊巢生

彭树敏字蒲前，号存举，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丁酉）五月五日，出生于江西萍乡小西路腊市凰岗新厅下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彭渭贤，是前清秀才，教书为业。生有九子二女，树敏排行第四。一九〇三年读小学，一九一一年读完高小，一九一五年毕业于萍乡中学。由于他天资聪颖，攻读勤奋，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父亲虽尝设馆教书于马迹塘、新塘、深塘里等地，但坚守“古者易子而教”的信条，在树敏中学毕业后，仍令他就读于外祖家私塾，学习五经古籍。这时树敏已受新思潮影响，对此颇有反感，而塾师管教甚严，常要他背诵，由于他聪敏过人，每读一遍即可流畅背出，以是塾师不加苛责，他也因此可以广泛阅读新书，从而深知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工业科学落后，农村经济破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种种现实情况，使他深怀忧国忧民的思想，尤以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更加激发他要求出国学习，以遂救国救民的愿望。但迫于家贫，学费无着，适国内勤工俭学运动高涨，又给他带来希望，仍先赴北京法文专修馆补习法语，并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五日和同乡蔡源高、文名升结伴，由上海勤工俭学会介绍，一行三十余人乘法国邮轮博尔多斯号去法国，就读于木兰公学。

一九二一年，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处于求学不能、做工不易、生活无着的境地，相继爆发了三次重大斗争，彭树敏和其他同学到法后，均积极参加和支持这些行动，以争取求学和工作的权利。“二二八”运动虽然取得“暂领维持费”的结果，但终未解决勤工俭学的根本问题，树敏和李林等五同学不愿在巴黎领取维持费，毅然接

受勤工俭学会的介绍，去圣乃德铁工厂工读，学习钳工，表现了他对勤工俭学的坚强意志。当时在该厂工具车间工读的已有一月份来的旅法勤工俭学生十人，其中有江西同学傅烈、饶国璋、饶来杰、江学轩、涂名扬五人，他们根据勤工俭学会与厂方协议，练习期六个月，学习期满即分配到该厂其它制造车间为技工，他们同住在厂方指定的工棚宿舍内，树敏并参加江西同学组织的伙食团，朝夕相处，互学互励，过着团结友爱的集体生活，且积极参加当地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

彭树敏在勤工俭学中，不畏艰苦，坚持又工又读，钻研马列主义，追求真理，立志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日常言论和行动中，也表现了助人为乐，团结工人，在同学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在此期间，在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的江西同学，曾相约向江西省政府请求拨款救济，推举傅烈起草申请书，结果得到一次救济款，江西当时在法的学生总共二十五人，于是由肖健发起，在巴黎成立了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以资联络，互通声气，并借以相互协助，以达到各人工读的最终愿望。

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间，圣乃德铁工厂工人为反对厂方资本家采取的种种压迫手段而举行的一次大罢工，李林、黄昌铭、傅烈、彭树敏等积极响应，并推动在工具车间学习徒工一十五位中国同学一起参加这次罢工，与法国工人一道反对厂方对工人的种种压迫手段，从而获得参加罢工的法国工人热烈欢迎和赞赏。尔后反对“中法大借款”和争取“进里大求学权利”等运动，当时在哈佛勒地区作工的中国同学虽未能派代表参加，但李林、傅烈、彭树敏等同学都对领导运动的有关组织和同学采取通函的方式予以响应和广泛宣传，给他们以鼓励和支持。

一九二二年内，在圣乃德厂做工的彭树敏和傅烈、饶来杰等在领到江西的救济款和自己挣到的工资后，便先后去巴黎，由勤工俭学会介绍入其他各地学校工读。彭树敏便由哈佛勒去××学校工读，并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当地各项革

命活动，一九二四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四年秋，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选派一批党员去苏联学习，在江西同学中有彭树敏、傅烈、饶来杰三人，随同蔡畅、聂荣臻、穆青、廖仁先、陈家珍等十多位同学，于九月由巴黎经柏林、汉堡，渡波罗的海，到达苏联列宁格勒，十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该校和先他们前去的罗觉、陈延年、王若飞、叶挺、刘伯坚、朱克靖、黄镜以及江西同学熊雄、肖复之、袁冰冰等数十人，同在该校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中国班学习。彭树敏在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刻苦用功，勤奋努力，研究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斗争的本领。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国内革命运动迅速发展，需要干部甚急，彭树敏、黄镜（组长）、饶来杰等五人奉调回国工作，经海参崴回到上海，当由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接见并分配彭树敏到江西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初调至郑州，与刘昌炎同志（后为安源市委书记）等共同从事郑州铁路工人运动，以后又去天津从事军事运动，在冯玉祥部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冯部受挫后，又去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彭树敏调至上海工作。

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不久便克复了湖南、江西萍乡、宜春一带，为策应国民革命军行动，彭树敏被派回江西九江，寓于九江河街春和客栈，以照相营生作掩护，秘密进行活动，任务是组织南浔铁路工人罢工，截断江西军阀邓如琢部的援兵交通线，使敌人无法增援，策应国民革命军迅速前进。为便于进行工作，彭树敏乃迁居于南浔铁路线党的特派员熊好生同志家，不料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侦探已侦悉熊好生等同志正在组织南浔铁路工人罢工行动，孙部即于九月十一日深夜包围熊好生同志住所，当时在场的只有彭树敏和南浔铁路工会会员杨家洪、彭冰生三人，即对他们进行搜查，在彭树敏身上搜出国民革命军分省作战地图和草拟揭发北洋军阀罪行稿纸，便将他们三人拘捕入狱，并对彭树敏进行审讯，反动军阀对他

严刑拷问，树敏坚不吐露工作任务，同时又设法通知在九江工作的留法勤工俭学同学谢远霸和任九江商务督办的谢远涵兄弟，请其予以保释，而反动军阀孙传芳部为了镇压群众的反抗行为，拒不同意。彭树敏已知反动军阀即将对他下毒手，乃口述遗嘱于同狱彭冰生族叔转告家中：“我已为国捐躯，不孝罪大，忠孝不能两全，请老父善自珍重。侄儿辈，量彼心性，当耕者耕，当读者读，莫失祖先遗风，绅侄（彭立宪同志，北伐革命军到达萍乡后即参加革命活动，以后参加秋收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萍乡小西路秋收起义受挫后出走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九二九年死于南昌豫章监狱——笔者注）要出洋，我已托密友介绍入党。”

九月十八日，反动军阀以“谋反叛逆，捣乱国政”的罪名将彭树敏同志惨杀于浔阳江畔，彭树敏同志牺牲时，历数反动军阀的罪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然后含笑就义。树敏被害后，反动军阀就将他尸首剖开，将头颅挂在九江闹市示众。

十月，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九江，当时《江西民国日报》刊出“军阀惨杀党人彭树敏”的消息，传至萍乡后，萍乡县党政军各界即在彭树敏烈士家乡腊市万寿宫举行盛大追悼仪式，安源市委书记刘昌炎同志等到会，以表达萍乡各界人民对他的以身殉国的崇高敬意与深切的悼念。

红十军团进军皖南、浙西南的斗争

张德华

一、向皖南行动的前后

我是一九三三年冬由闽浙赣省红军重伤医院调到红十军卫生部主持工作的。当时红十军的主要首长是：军长王如痴、军政治委员唐在刚、军政治部主任王弼。一九三四年是蒋介石对各苏区继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在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下，疯狂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敌人改变了过去急进的战略，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政策，逐步向我苏区推进。用封锁政策来缩小革命根据地，企图包围消灭我军。赣东北军民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虽然给了敌人重大打击，打死打伤敌人在五万左右，但最终没有阻止敌人步步筑堡前进。由于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人员、物资补给及财政十分困难，省委及方志敏同志根据中央电令，决定红十军暂时离开赣东北苏区，向皖南进军，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创建皖南新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红十军在上饶老鸦尖、横峰莲荷、营山张家等地给了敌人廿一师、十二师狠狠打击后，回师集中到德兴县重溪休整补充。当我红十军到达重溪的第三天，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也由浙江开化开来了。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红十军同北上抗日先遣队合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方志敏同志任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刘畴西同志任军团长，乐少华同志任军团政治委员，刘英同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同志任军团参谋长。此外